

下载封面新闻APP
浏览最新资讯

对话

阿来
四川首位茅奖鲁奖双料得主

“五月，或者六月，第一种蘑菇开始在草坡上出现。就是那种可以放牧牛羊的平缓草坡。那时禾草科和豆科的草们叶片正在柔嫩多汁的时节。一场夜雨下来，无论直立的茎都吱吱咕咕地生长。草地上散落着团团灌木丛、高山柳、绣线菊、小蘖和鲜卑花。草蔓延到灌木丛的阴凉下，疯长的势头就弱了，总留下些潮湿的泥地给盘曲的树根和苔藓。五月，或者六月，某一天，群山间突然就会响起了布谷鸟的鸣叫。那声音被温暖湿润的风播送着，明净，悠远，陡然将盘曲的山谷都变得幽深宽广了。布谷鸟的叫声中，白昼一天比一天漫长了……”

——摘自阿来《蘑菇圈》

『自然三部曲』
警醒世人对资源的过度消费『乡村之子』
阿来格外关切农民和农村

冬日，阿来在考察途中小憩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杨谨烛 受访者供图

读《蘑菇圈》，会明显感觉到一种清新的诗意。读过阿来《尘埃落定》的人不会感到陌生。

这种清新的诗意，来自阿来家乡高原的雪山，携带着他对大自然的熟悉和热爱。阿来是乡村之子，早早接触大自然。他说，这种对植物、自然的热爱，既来源于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，同时也是长大后自己对植物学知识学习积累的结果。

获奖作品《蘑菇圈》是一部中篇小说。最早刊载于2015年第3期《收获》，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之出版成书。小说中对蘑菇成长状态细致的描写，主要还是基于阿来年幼时的生活经验。“对他们太熟悉了，我们会跑去山坡捡拾蘑菇，观察他们成长，也见证过它们在地上的腐烂。”阿来用少年时代才会有过的天真、美好的眼光来看待自然界，《蘑菇圈》中，有很多我小时候的感觉在。”

1/

《蘑菇圈》是阿来近年来创作的“自然三部曲”之一，另外两部是《三只虫草》和《河上柏影》，每一部都跟高原上的一种物产相关——虫草、虫草和岷江柏。

在《三只虫草》中，讲述了藏区小学生桑吉为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逃课挖虫草的故事。面对着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，桑吉纯净的心灵世界显示出了一种高贵。《蘑菇圈》里，一生守护山中生生不息的“蘑菇圈”的藏族女人斯炯，从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，经历了诸多人事变迁，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。《河上柏影》中的主角则是视五棵柏树为精神依靠，心灵纯净善良的藏族母亲，以及沉默寡言、勤恳辛劳的木匠父亲。伴随着现实对传统村庄生活方式的影响，一幅岷江岸边三十余年的画卷徐徐铺展开，有水波荡漾的岷江，也有岸边的柏树，以及柏树下的人家。

“三部曲”以诗意、空灵、优美的文笔，讲述了小人物与物产互相依偎的生命故事，小说充盈着一种温暖而动人的格调，引发读者关注自然。阿来表示，自己想表达的是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费，“以前虫草在农村只是自给自足的作物，但现在，有钱人的社会对这个东西趋之若鹜，甚至出口到了国外。这就不只是因为温饱，而是出于商业目的。以前不值钱的虫草，现在卖到500元一公斤，商业的力量就把农村自然形成的方式瓦解了。”

2/

阿来非常关注美国的自然主义文学，而对待国内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，他也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呼吁每个人有所行动。“环境问题，自然生态，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问题。但我们的现实文学作品反映得还不够。在这方面我做得比较早，希望能起到一个先锋作用。”《蘑菇圈》获得鲁奖的青睐，也让阿来增长了信心。

作为乡村之子，阿来对农民、农村格外关切。这种包含着悲悯、敬重的关切，贯穿于阿来的多部作品中。

2018年4月，阿来的《随风飘散》《天火》《达瑟与达戈》《荒芜》《轻雷》《空山》六个相对独立又彼此串联的中篇作品，被出版社以《机村史诗》之名再版。虽然离初版时间已经过去12年，但今天读起来，依然很切中当下大家对乡村、社会的关注点，不仅毫不过时，反而显得很有预见性。

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的散文《大地的语言》中，阿来写道：“农业，在经济家的论述中，是效益最低、在GDP统计中越来越被轻视的一个产业。在那些高端的论坛上，在专家们演示的电子图表中，是那根最短的数据柱，是那根爬升最乏力的曲线。问题是，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，又不能直接消费那些爬升最快的曲线。不能早餐吃风险投资，中餐吃对冲基金，晚配上红酒的大餐不能直接是房地产。那些能将经济高度虚拟化的赚取海量金钱的聪明人，身体最基本的需求依然来自土地，是小麦、玉米、土豆，他们几十年生命循环的基础和一个农民一样，依然是那些来自大地的最基本的元素。他们并没有进化得可以直接进食指数、期货、汇率。”

阿来

『乡村之子』笔下的自然与人

《蘑菇圈》并非旧乡村的挽歌
对消亡的文化，应有一定的尊重

阿来有很深的乡土情结。

“乡村是我的根子，乡村是很多中国人的根子，乡村也是整个中国的根子。虽然今天人们正大规模迁移到城市，但土地与粮食依然在那里，很多人的生命起源也在那里。即便后来拜教育之赐离开了乡村，我也从未真正脱离。因为家人大多都还留在那里，他们的种种经历，依然连心连肺。而我所能做的，就是为这样的村庄写下一部编年史。”阿来说，这种情结又不单纯是一种情感，也来自对农业的深刻认识。阿来相信利奥波德所说：“人们在不拥有一个农场的情况下，会有两种精神上的危险，一个是以早饭来自杂货铺，另一个是认为热量来自火炉。”

在一个工业时代，农业社会遭受到生活方式和灵魂节奏的冲击，影响辐射到文学上，让阿来的笔下有一种痛楚感。“正是那种明晰的痛楚，成为我写作最初的冲动，也是这种痛楚，让我透过表面向内部深入。”阿来轻盈的文笔中，能读出对农人命运的痛感。阿来坦言，这种痛感以前更强烈，“我们这个时代，有成功者，也有不那么成功的人，对变化不太适应的人以及失败者。我想对那些非成功者或失败者多一些关注。而成功与否，在当下，跟一个人本身的能力、品行也不完全对等。比如一个农民，在农产品价格下降的时候，他的勤劳带来的粮食丰收，却反而让市场价格更低，让他更不容易成功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的命运，除了跟自己的能力、品行、选择有关，还有很多无奈的、被动的客观因素。我们不能单纯以世俗意义的成功来判断一切。”

同时阿来也强调，自己不是一个一味怀旧的人，《蘑菇圈》这部小说也不是旧乡村的一曲挽歌，“因为我深知一切终将变化。我只是对那些为时代进步承受过多痛苦、付出过多代价的人们深怀同情。”

对于时间带来的变化，阿来也有足够的智慧应对，“我不悲悼文化的消亡，但我希望对于这种消亡，就如人类对生命的死亡一样，对它有一定的尊重。悲悼旧的，不是反对新的，而是对新的寄予了更高的希望。”现在他每次回乡，都能看到年逾八旬的父亲在尽力看着着山林。那些残留的老树周围，年轻的树苗茁壮成长，并已郁闭成林。从清晨到傍晚，都有群鸟在歌唱。出家门几十米，坐在了荫庇着儿时记忆的高大云杉荫凉中，听到轻风在树冠上掠过，嗅到浓烈的松脂的清香，阿来说，就在那里，心中又滋长出了希望。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杨谨烛扫码上封面新闻
看精彩短视频，看阿来讲述自然与人。

争议

阿来与文学奖的缘分不浅，但也不都是美好的。

2014年8月11日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名单公布了实名投票细节。阿来的入围作品《瞻对》原先被外界视为获奖热门，最终竟得零票。之后，阿来接受媒体采访时，公开发声表达质疑“三问鲁奖”。他解释说：“我发声抗议，是因为我对自己得零票感到不解，有疑惑，我要质疑。我质疑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也不是为了名利。那我为什么要明确表达态度呢？我这么做不是得罪人嘛。但是我想为文学说话。”这件事引发广泛关注。

当年三问鲁奖
是光明正大的

时隔四年，再谈此事，阿来心态平静，他说：“其实我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我的票数最后会变成零票？我希望得到一个回答。而且，我提出的疑问是光明正大的，也清清楚楚地提出了我具体的疑问点，比如为什么非虚构作品不算是报告文学？那报告文学的概念是什么。这是我公开的态度，希望相关负责人能给我一个解释。”

“其实，这么公开发声，也是想证明一下，就这么光明正大地，提出自己的疑问，行不行得通。鲁迅先生所在的那个时代，跟胡适等人论战的时候，他们都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的，在报纸上进行笔战。就是指名道姓我就要跟你讨论这个事情。笔战是文人争论的传统。我觉得，有疑问就拿到台面上说，这是一个光明的路子。”阿来说。

“非虚构”是对
报告文学的拯救

对于“非虚构文学”与“报告文学”这两种文体，阿来有非常明晰的看法，“非虚构文学就是对报告文学在当下日益走下坡路、日益庸俗的一个拯救。”报告文学的毛病到底在哪呢？“就是它基本上就变成了写好人好事。当然，‘好人好事’不是不能写，而是怎么写好的问题。”非虚构文学里面允不允许虚构的成分，现在又在讨论。阿来秉承“有一份材料说一分话”，“当然你可以发表一些对这些事情的议论跟着法，但事实不能虚构。历史人物的内心活动你可以猜测，也可以分析，但你得对读者交代清楚，这是你个人的猜测和分析。比如我在《瞻对》里写乾隆拿到一个折子后的心理活动。我在写他心理细节的时候，我会告诉读者这是我个人的推测。否则那就是写虚构小说了。当然，散文对虚构没有硬性规定。非虚构还是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在那里。‘非虚构’这三个字就一切都说明白了。”提到在非虚构领域的名家，阿来提到，四川有高手，“比如岱峻，他写李庄、华西坝，写得很好。”

豪爽的性格，让阿来在文学圈有不少好朋友。在同行里，他喜欢“那些确实对文学有坚持的人。”他提到，几年前当麦家还在成都工作生活，两人一周至少要见一次面。“两人约定在一个地方。然后各自从家中同时出发，走一个多小时，基本同时能到达相约地。”两人会聊文学，也会聊别的。然后一起吃饭、喝茶，各自走回家，这样的状态，持续了大概近三年时间。“身体也锻炼了，精神上也很畅快。麦家对文学是非常痴迷，而且认真的。他对阅读、写作的执着心，也是我比较欣赏的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
实习生 杨谨烛